

中华名人纪实丛书

1

中共党政军领袖人物卷

岁月消磨不了的记忆

关鸿 余之 成平主编

珠海出版社

关鸿 余之 成平主编

中华名人纪实丛书



国防大学 2 062 9195 7

岁月消磨 名人的记忆

珠海出版社

(粤)新登字 1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岁月消磨不了的记忆/关鸿等编

(中华名人纪实丛书)

ISBN7-80607-109- ¥15.80 元

I. 岁…

II. ①关… ②余…

III. 中国—纪实—名人

IV. I25

岁月消磨不了的记忆

◎ 关鸿 余之编

终审:成平

策划:成平 魏心宏

责任编辑:李一安

装帧设计:金星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地址:珠海吉人景乐路图书大厦4层

电话:3331403 邮政编码:519015

印刷:南昌市印刷十二厂

开本:850×1168mm 1/32

印张:12.625 字数:305千字

版次:1995年12月第1版

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册

ISBN7-80607-109-1/I·66

定价:15.80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[本书系编选作品,因部分作者地址
不详,请速与本社联系,寄稿费样书。]

目 录

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	罗章龙 (1)
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	
——回忆与随想	丁 玲 (9)
张闻天的最后岁月	吕明方 (36)
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	
——记少奇同志二三事	王光美 (51)
我心中的周恩来	铁竹伟 (65)
周恩来和夏衍的相交与相知	沈祖安 (126)
犹闻总理击节声	王 昆 (149)
周总理与京剧艺术家	萧 枫 (159)
帚翁话旧	吴组缃 (164)
宋庆龄和史迪威及其晚辈的友谊	吕德润 (173)
宋庆龄和她的孩子们	
任德耀满怀深情忆往事	李 涵 (184)
此处无声	
宋庆龄最后的岁月	陈漱渝 (193)
我与王稼祥	朱仲丽 (207)

赤子之心

- 怀念彭德怀同志 浦安修 (230)
- 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城市 何晓鲁 铁竹伟 (245)
- 病危中的陈毅 汤 雄 (312)
- 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
- 我认识的黄克诚同志 李 锐 (326)
- 岁月消磨不了的记忆
- 在“东大”一年半的日子 萧 三 (340)
- 非凡的年代 罗点点 (345)
- 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 曾 志 (363)
- 难忘的回忆 华罗庚 (394)

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

罗章龙

“五·四”时，在这里高举过爱国红旗，点燃过革命火炬，红楼话旧，不能不谈到曾举旗点火的陈独秀先生。

反清反袁 志同道合

陈先生由蔡元培校长一再敦请才到北大。高一涵、刘季平、汪孟邹、汪元放等熟悉陈先生的安徽人告诉了我许多关于他的情况。

陈独秀先生字仲甫，笔名实庵，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。父亲陈昔凡是个举人，在东北辽阳、新民当过知县和知府。陈先生随父在东北读过书，以后回安徽考取秀才。1903年留学日本的时候，参加了反清革命。当时，清政府所派留学生监督姚昱破坏学生革命活动，引起强烈不满。有次他作奸犯科，被当场逮住，挨了一顿痛打之后，即由“张继抱腰、邹容捧头、陈独

秀挥剪”，把姚的辫子剪掉。这次“割发代头”引起清政府向日本政府严重交涉，结果张继等三人被迫回国。

陈先生回国后，在上海和安徽先后办过《俗话报》和《国民日报》从事革命宣传活动。1904年，他在芜湖安徽公学任教时，与柏烈武（即柏文蔚，也在公学教体操）等创设岳王会，遂被推举为会长。1905年以后，岳王会会员加入了同盟会。岳王会为效法岳飞精忠报国，实际上是策动新军起义和暗杀军政大员的秘密组织。陈先生因此经常往来安徽、上海等地，从而认识了蔡子民、杨笃生等革命党人。吴稚（陈先生在安徽公学任教时的学生）1905年在北京谋刺载泽等五大臣的事，就是他们三人策划的。辛亥革命后，陈先生先后担任过安徽都督孙毓筠、柏文蔚的秘书长。他同柏文蔚一起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。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，陈先生亡命上海，闭户著书，以后办了《青年杂志》。陈、蔡两先生自己也说过，他们早就相识，是志同道合的同志。所以，陈先生被请到北大主文科并不是偶然的。陈、蔡两先生经过在北大这段共事，进一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1932年，陈先生在上海被捕，蔡先生就曾与宋庆龄、杨杏佛诸先生一道，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宽释。1933年亚东图书馆出版《独秀文存》时，蔡先生又特为写了序言。蔡先生1940年病逝，陈先生也专门写了追悼和怀念的文章，其中便谈到了他们相识的经过和“五·四”一起战斗的情形。

精通小学 太炎“畏友”

陈先生担任北大文科学长，是蔡先生出长北大后发出的第一号校长室通告宣布的。消息传出，全校震动。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，奔走相告，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，啧有烦言。他们的“理由”之一，是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

文，并无真才实学；到北大任教，尚嫌不够，更不要说出长文科了。蔡先生对于这些攻击，态度是鲜明的，驳斥也是有力的。他说，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，学有专长，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。熟悉陈先生的人也出来讲话，说他在文学考据方面有素养、有研究、有著作，高一涵先生甚至说，仲甫先生讲文字学，不在太炎先生之下。这样众口一词，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。

我以后同陈先生多年接触，发现他一直热衷于研究文字学，尽管政治活动繁忙，他也从未间断这方面的研究工作。记得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，他曾告诉我说，他过去写过一本《字义类例》，里面虽有些特殊的见解，现在看来，有些问题还须进一步研究，准备再写一本专著。他要我帮助搜集各地方言资料，想弄清一些字的南北各地异音。我因为工作忙，没有来得及做。1923年“三大”以后，我调到中央工作时，他又向我旧事重提，说自己在这方面有些创见，不把它写出来实在可惜。听说他以后在监牢里和出狱以后，还一直从事文字学的著作，最后写成了一本书；商务印书馆也答应出版。我虽然没有看到这本书印出来，但从他的国学基础、见识卓越和富于钻研精神来看，蔡先生等人说他精通训诂音韵，学有专长，是可信的。他这方面的成就值得后来文字学者借鉴。

改革教学 校容大变

陈先生1917年初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，没有教课，专心致力于教学改革。我1918年进北大时，原先的文、理、法三科已改为18个系。陈先生负责的文科，也分成了中国文学、哲学、史学和外语的英、德、法、俄等七个系；先后聘任了胡适、陶孟和、李大钊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马叙伦、沈兼士、沈尹默、沈

士远、马裕藻、马衡等著名教授，真是济济多士，盛极一时；课程方面也有较大改进，不但必修课增加，还开了新的选修课，像李大钊先生开的《唯物史观》，把马克思学说搬进大学讲堂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事。陈先生改革教学的这些措施，促进了学术研究和思想解放，使北大在思想界、学术界居于领先地位。

提倡新文化 强调政治革命

陈先生到北大后，把《新青年》编辑部也搬到了北京，主编改由陈先生和李大钊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胡适、鲁迅、沈尹默等轮流担任。

当时中国处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政府反动统治之下，内忧外患达于极点。《新青年》高举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旗帜，提倡民主，提倡科学，主张政治革命；宣扬新文化，反对旧礼教，喊出了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口号，特别是发表李大钊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学说的文章，在当时中国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。《新青年》宛如火炬，照亮了全国青年前进的道路，它为“五·四运动”做了大量的思想准备工作，作为《新青年》主编的陈先生，自然而然地成了“五·四运动”公认的领袖。但以后有人却想把“五·四运动”领袖的桂冠加在胡适头上。胡适当时虽然也被动地参加了新文化运动，但思想很右，“五·四”时他并不在北京，他正在上海欢迎杜威。连他本人当时也常说他有“四不如”：“主张思想自由，不如蔡子民；主张政治革命，不如陈独秀；打倒孔家店，不如吴虞；写作白话诗，不如康白情。”胡适也承认，“陈先生是一位革命家，……在袁世凯要实行帝制时，陈先生知道政治失败是因为没有思想文化这些革命，他就参加理论革命，宗教革命，道德革命。在《新青年》上有许多改革

的信条。……民国五年袁世凯死了，他说新时代到了，有史以来各种罪恶耻辱都不能洗尽，然而新时代到了。他这种革命精神，与我们留学生的消极态度，相差不知多少，他那时所主张的不仅是政治革命，而且是道德艺术，一切文化的革命。”

“出了研究室 便入监狱”

陈先生当时确具革命领导者的品质。

他学识渊博，才能出众，目光敏锐，敢说敢干。与刚从美国留学回来，倾心于美式民主，宣扬实用主义的胡适相反，他常向我们谈到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，对巴黎市民攻破巴士底狱和建立工人政权的革命壮举十分向往。他常说，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有二：一是科学研究室，一是监狱；并以“出了研究室，便入监狱”、“出了监狱，便入研究室”的豪言，与我们青年共勉。“五·四”时他一再强调要采取“直接行动”，对中国进行“根本改造”。

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。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，亦步亦趋，团结在他的周围。正是在他这些号召的鼓动下，易克嶷、匡互生、吴坚、宋天放、李梅羹、王复生、刘克俊、夏秀峰、张树荣、吴慎恭、吴学裴、王有德、高尚德、张孝謩和我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，在“五·四”前夕，秘密组成了一个“行动小组”。在“五·四”那天采取了“火烧赵家楼，痛殴章宗祥”的“直接行动”。

陈先生不只号召青年行动，他自己也带头参加了示威游行。6月11日，他又带领我们上街散发《市民宣言》。那一天，陈先生在新世界香厂游艺场屋顶撒传单时被侦探盯住了，行到天坛被他们逮捕。

南陈北李 战斗情深

陈先生6月11日被捕是“五·四运动”中的大事。他这个“思想界明星”（毛泽东同志语）和“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，革命的先锋”（李大钊先生语），老早就被北洋政府看作“过激派”的首领，欲得而甘心。而他被捕时散发的《市民宣言》里，又提出了五项强烈要求：“一、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的权利，并取消民国四年、七年两次密约；二、免去徐树铮、曹汝霖、陆宗舆、章宗祥、段芝贵、王怀庆六人官职，并驱逐出京；三、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；四、北京保安队改为市民组织；五、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。”这五项要求揭发了北洋政府勾结日本、出卖主权的罪恶，反指名道姓地要求惩办当政的显要，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解除反动政府武装的要害问题。并且，《宣言》最后强硬提出：“倘政府……不完全听从市民的希望，我等学生、商人、农工、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，以图根本的改造。”这就是说，要采取革命行动，推翻反动政府了。如今这个“乱党”首领落在了对手——一帮杀人眨眼的反动派手里，要是被他们杀害，将对“五·四运动”造成严重后果。

李大钊先生一向对陈独秀先生十分敬佩，看到陈先生落在敌人手里，非常着急，马上领导我们设法营救。大家想出来的办法，首先是将陈先生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，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，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，不敢胡作非为。果然，这个消息由北京学生致上海学生的电报传出后，全国舆论沸腾，函电交加，要求释放。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同志就曾写了一篇《陈独秀之被捕的营救》，登在1919年7月14日出版的《湘江评论》创刊号上，对陈先生的被捕表示强烈的抗议。毛泽东同志在叙述了陈独秀被捕各方营救的情形之后大声疾呼：“现在中国可谓危险极了！”他指出：“危险就在于没有科学和民主，而陈先生

平日所标榜的就是这两样，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，无非是为着赛恩斯（科学）和德莫克拉西（民主）。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，社会就居然把逮捕报给了他。”毛泽东同志接着严正指出：“陈君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，并且是留着一个大大的纪念于新思潮，使它越发光辉远大。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。就是处死了，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。陈君原自说过，‘出实验室即入监狱，出监狱即入实验室’，又说‘死是不怕的’，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。我祝陈君万岁，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。”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激起全国的强烈反响。

孙中山先生当时在上海，一见到徐世昌、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，就郑重提出陈独秀被捕的事，他指出：“你们做了‘好’事，很足以使国人相信，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。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，死了一个，就会增加五十、一百个，你们尽管做吧！”许世英听了这番话，口口声声说：“不该，不该，我就打电报回去。”孙中山先生出面讲话干预，是我当时听他身边人写信到北京传出的。

另一方面，李大钊先生想了各种方法来营救，对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人就产生了一定影响。在当时的形势下，北洋政府已被群众运动吓破了胆，生怕事情闹得不可收拾。于是，才在9月中旬将陈先生释放出来。

陈先生出狱，革命人民皆大欢喜，李先生尤其感到高兴，特写了一首诗《欢迎独秀出狱》：

你今出狱了，
我们很欢喜！
他们的
强权和威力，

终究战不胜真理。
什么监狱什么死，
都不能屈服了你；
因为你拥护真理，
所以真理拥护你。

李先生这首新诗，表达了“南陈”与“北李”之间的革命情谊，描绘了“五·四”时期陈先生的精神面貌，反映了当时革命青年的高昂斗志。李先生这首诗为当日红楼战斗留下了一块纪念碑。

微服出京 再上征途

陈先生虽然出了狱，但随时还有再次被捕的危险，他不得不在刘文典先生家躲藏下来。李先生为了他的安全，遂与同志们反复研究，最后征得陈先生同意，决定送他出京。李先生亲自就如何护送问题精心设计，并为此一度亲到天津，作出了周密妥善的安排。1919年年底，李先生带了几个学生，与陈先生一起，都打扮成商人，雇了一辆骡车，趁着晨光曦微悄悄出城，由小路经廊坊前往天津。李先生是位老成持重、胆大心细的人，他一口地道的河北口音，乡情又熟，装扮得也活像商人，因此，他们一路非常顺利，平安到达天津。

1920年1月，李先生又在天津亲送陈先生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。从此，陈先生结束了红楼生活，踏上新的征途。

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

——回忆与随想

丁 玲

王剑虹

我首先要介绍的是瞿秋白的第一个爱人王剑虹。

1918年夏天，我考入桃源第二女子师范预科学习的时候，王剑虹已经是师范二年级的学生了。那时她的名字叫王淑璠。我们的教室、自修室相邻，我们每天都可以在走廊上相见。她好像非常严肃，昂首出入，目不旁视。我呢，也是一个不喜欢在显得有傲气的人的面前笑脸相迎的，所以我们从来都不打招呼。但她有一双智慧、犀利、坚定的眼睛，常常引得我悄悄注意她，觉得她大概是一个比较不庸俗、有思想的同学吧。果然，在1919年“五·四运动”爆发后，我们学校的同学行动起来时，王剑虹就成了全校的领头人物了。她似乎只是参与学生会工作的一个积极分子。但在辩论会上，特别是有校长、教员参加的一些辩论会上，她口若悬河的讲词和临机应变的一些尖锐、辟透的

言论，常常激起全体同学的热情。她的每句话，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，把一些持保守思想，极力要稳住学潮，生怕发生越轨行为的老校长和一些教员们问得瞠目结舌，不知如何说，如何作是好了。这个时期，她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。她像一团烈火，一把利剑，一支无所畏惧、勇猛直前的队伍的尖兵。后来，我也跟在许多同学的后边参加了学生会的工作，游行、开讲演会、教夜校的课，但我们两人仍没有说过话，我总觉得她是一个浑身有刺的人。她对我的印象如何，我不知道，也许觉得我也是一个不容易接近的人吧。

这年暑假过后，我到长沙周南女子中学，后来又转岳云男子中学学习。在这两年半中，我已经把她忘记了。

1921年寒假，我回到常德，同我母亲住在舅舅家时，王剑虹同她的堂姑王醒予来看我母亲和我了。她们的姐姐都曾经是我母亲的学生，她们代表她们的姐姐来看我母亲，同时来动员我去上海，进陈独秀、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。原来，王剑虹是从上海回来的，她在上海参加了妇女工作，认得李达同志的爱人王会悟等许多人，还在上海出版的《妇女声》上写过文章。她热忱于社会主义，热忱于妇女解放，热忱于求知。她原是一个口才流利，很会宣传鼓动的人，而我当时正对岳云中学又感到失望，对人生的道路感到嶮徨，所以我一下子决定终止在湖南的学业，同她冒险到一个熟人没有的上海去寻找真理，去开辟人生大道。

从这时起，我们就成了挚友。我对她的个性也才有更深的认识。她是坚强的，热烈的。她非常需要感情，但外表却总是冷若冰霜。她是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女儿。我虽然从小就没有父亲，家境贫寒，但我却有一个极为坚毅而又洒脱的母亲，我从小就习惯从痛苦中解脱自己，保持我特有的乐观。……

但现实总是残酷的。我们碰到许多人，观察过许多人，我

们自我斗争，但我们对当时的平民女校总感到不满，我们决定自己学习，自己遨游世界，不管它是天堂或是地狱。当我们把钱用光，我们可以去纱厂当女工、当家庭教师，或者当佣人、当卖花人，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、去生活，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。

1923年夏天，我们两个到南京来了。我们过着极度俭朴的生活。如果能买两角钱一尺布作衣服的话，也只肯买一角钱一尺的布。我们没有买过鱼肉，也没有尝过冰淇淋，去哪里都是徒步，把省下的钱全买了书。我们生活得很有兴趣，很有生气。

一天，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。这就是柯庆施，那时大家叫他柯怪，是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。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，一坐半天，谈不出什么理论，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。我们大家不喜欢他，但他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，想找一个女友谈谈恋爱，或是玩玩。因此，我们尽管嘲笑他是“（三）烂板凳”（意思是说他能坐烂板凳），却并不十分给他过不去，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。这年，他不知从什么地方知道我们在这里，便跑来看我们，还雇了一辆马车，请我们去游灵谷寺，这个较远的风景区我们还未曾去过咧。跟着，第二个熟人也来了，是施复亮（那时叫施存统），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好人，他是最早把我们的朋友王一知（那时叫月泉）找去作了爱人的，他告诉我们他和一知的生活，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。这些自然引起了我们一些旧情，在平静的生活中吹起一片微波。后来，他们带了一个新朋友来，这个朋友瘦长个儿，戴一副散光眼镜，说一口南方官话，见面时话不多，但很机警，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，就不动声色的渲染几句，惹人高兴，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的飘过来，我和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。这个人就是瞿秋白同志，就是后来曾领导过共产党召开“八·七”会议，取代了机会主义的陈独

秀，向来又被称为盲动主义的瞿秋白；就是做了许多文艺工作，在文艺战线有过卓越贡献，同鲁迅建立过深厚友谊的瞿秋白；就是那个在国民党牢狱中从容就义的瞿秋白；就是那个因写过《多余的话》被“四人帮”诬为叛徒，掘坟扬灰的瞿秋白。

不久，他们又来过一次，瞿秋白讲苏联故事给我们听，这非常对我们的胃口。过去在平民女校时，也请另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讲过苏联情况。两个讲师大不一样，一个像瞎子摸象，一个像熟练的厨司剥笋。当他知道我们读过一些托尔斯泰、普希金、高尔基的书的时候，他的话就更多了。我们就像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似的都听迷了。

他对我们这一年来的东流西荡的生活，对我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，都抱着极大的兴趣听着、赞赏着。他鼓励我们随他们去上海，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。我们怀疑这可能又是第二个平民女子学校，是培养共产党员的讲习班，但又不能认真的办。他们几个人都耐心解释，说这学校要宣传马克思主义，要培养年青的党员，但并不勉强学生入党。这是一个正式学校，我们参加文学系可以学到一些文学基础知识，可以接触到一些文学上有修养的人，可以学到一点社会主义。又说这个学校原是国民党办的，于右任当校长，共产党在学校里只负责社会科学系，负责人就是他和邓中夏同志。他保证我们到那里可以自由听课，自由选择。施存统也帮助劝说，最后我们决定了。他们走后不几天，我们就到上海去了。这时瞿秋白同志大约刚回国不久。

上海大学

上海大学这时设在中国地界极为偏僻的青云路上。一幢幢旧的、不结实的弄堂房子，究竟有多大，我在那里住了半年也弄不清楚，并不是由于它的广大，而是由于它不值得你去注意。